

人，
岁月，
生活

第三部

伊里亚·爱伦堡著



2 036 8051 5

人、岁月、生活

第三部

爱伦堡著

秦顺新 冯南江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北京

书号		
军事学院军事资料室		

人、岁月、生活 (第三部)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顺义印刷厂印刷

字数188,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10 $\frac{3}{4}$

1979年4月北京第1版 1979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6,000

书号 10019·2766 定价 1.00 元

一九二一年晚秋，我离开了无忧无虑的布魯塞尔，来到了柏林。德国人的生活就像在火車站上一样，誰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报童們喊着：“柏林日报！最新消息！最新消息！薩克森发生了共产党暴动！慕尼黑有人进行阴谋活动！”人們一面默默地讀着报纸，一面走去上班。商店老板每天都要更換貨物价格的卡片；馬克在不断地貶值。在庫尔福尔斯特大街上，走着一群群的外国人；他們用低价收购古董。穷人住宅区的几个面包房被搗毀。看样子，一切都要崩潰瓦解，但是工厂的烟囱在冒烟，銀行职员規矩地写着大数目的数字，妓女拚命地往臉上塗脂抹粉，新聞記者在报导俄罗斯的饥饉或魯登道夫^①的高尚胸怀，小学生背誦着帝国往昔的輝煌業績。到处都可以看見小型舞厅，一对对瘦弱的舞伴在机械地搖晃着身子。爵士音乐震耳欲聾。我記得当时的两只流行歌曲：《你喜欢香蕉嗎？》和《我的黑皮肤的苏尼雅》。在

① 魯登道夫(1865—1937)，德国將軍，法西斯总体战理論的創造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間任德軍參謀長。

一个舞厅里，哑哑的男高音歌手凄惨地唱着：“明天就是世界末日……”然而，世界末日却迟迟未来。

凱勒曼^①发表了描写德国革命的长篇小说《十一月九日》。我不知道，这个日子是否能告诉年轻读者一些什么。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九日，德皇匆匆地逃往荷兰，社会民主党人宣布成立共和国。然而，在政府的各部里，却坐着过去的高官显贵，守门人毕恭毕敬地问候道：“您好，三级文官老爷。”我住在布拉格广场的一个小旅馆中；旁边就是宽阔的凱撒林荫道；我在城内溜了一遭，参观了巨大的霍亨索伦广场。小旅馆的房间里，威廉的像片依然高挂在墙上。

我认识了诗人卡尔·爱因斯坦。这是个快活的浪漫主义者，生着一个光秃秃的大脑袋，有个小瘤子点缀其上。他对我说他曾在西线当过兵，患了精神失常症。他对黑人雕刻的爱好，他那些亵渎神圣的诗以及那种已经成为过去时代的烟云的交织着失望与希望的混合情绪，使我回想起自己旧日的朋友们——“洛东达”的老顾客。卡尔·爱因斯坦写了一个关于耶稣的剧本，因此被控犯了亵渎神罪。我出席了法庭。审判是在一间半明半暗的大厅里进行的。通常，宗教狂热症的概念是和天主教、罗马教皇的训谕以及宗教裁判所连在一起的。但是烧死塞维

① 凱勒曼(1879—1951)，德国反法西斯主义的作家。

特医生的不是天主教徒，而是天主教徒視之为自由思想者的喀尔文教徒，他被判处火刑是因为沒有能将生物体的机能和上帝联系起来。在卡尔·爱因斯坦案件的审判过程中，法院鉴定人引证了二十世紀許多文明的神学家的著作。

（一九四五年，我看見了飽經战火的柏林。曾經在其中审讯过卡尔·爱因斯坦的那座建筑物，只留下了一段殘壁，上面有俄罗斯工兵写的几个字：此处地雷已清除。）

在一九二一年，柏林的所有东西都留給人一种幻觉。房屋正面胸脯丰满的瓦尔基利亚女神像毫无表情地聳立着。电梯繼續在开动，但室内却是一片寒冷和饥饿。电車售票員殷勤地扶着三級文官夫人下車，电車的路綫也还像过去一样，但是沒有人知道历史的路綫。灾难佯装成幸福。使我吃惊的是陈列在商店櫥窗內的許多玫瑰色和天藍色的护胸衣，它們是用来代替价錢昂貴的衬衣的，护胸衣本身就是一种招牌，即使它不能說明生活的幸福，也可以权充体面的证据。在我有时光顾的“約斯蒂”咖啡館中，一种名为“莫可”的劣等飲料是盛在金屬咖啡壺中，壺把上还套了个小手套，以免燙伤顧客的指头。点心是用冻土豆做的。柏林人还像过去一样吸着雪茄烟，他們說，这些烟是“哈瓦那雪茄”或“巴西雪茄”，其实这不过是用尼古丁泡制的白菜叶做的罢了。說得动听一些，一切都

像帝国时代那样，有条不紊。

一天晚上，我和刚从莫斯科来的弗·盖·李定一起出外散步。咖啡館很早上門：“宵禁”是战争年代的殘余。有个人走到我們跟前，建議我們去一个夜間營業的咖啡館。我們坐上了地下电車，随后又在昏暗的街道上走了很久，終于来到一座滿不錯的住宅的門口。室內的牆壁上挂着一些穿軍服的家人的照片和一幅表現日落景色的图画。主人給我們端来了香檳酒——檸檬水和酒精的混合物。过了不一会，主人的两个小姑娘来了，她們沒有穿衣服，給我們表演了几出舞蹈。其中一个和弗拉季米尔·盖尔曼諾維奇攀談起来，她說她很喜欢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說。母亲用滿怀期望的目光望着外国客人：也許，他們会喜欢自己女儿的，并且用美元付鈔，如果付的是馬克那就太糟了，明天早晨它又会貶值。这位可敬的媽媽叹了口气說：“这难道是生活嗎？这是世界末日啊……”

我来到柏林前不久，一群瘋狂的民族主义分子杀害了首都党的領導人之一爱尔茨貝格。“俾斯麦帝制协会”的拥护者毫不知耻地稱贊这次杀人行为。法律家装出了在研究法律条文的样子，社会民主党人腼腆地叹了口气，然而，未来的党卫軍分子却在练习活靶射击。

所有这一切都不妨碍把灾难当成天經地义的、秩序井然的生活。殘廢者尽量不使自己的假腿发出响声，沒

有胳膊的空袖筒也用別針卡住。面部被火药燒傷的人戴上了大墨鏡。在首都街道上，失敗的戰爭也沒有忘記使用迷彩。

報紙上說，送入育嬰堂的嬰兒，百分之三十在最初几天內死亡。（那些僥幸活下來的，也成了一九四一年的新兵和希特勒的炮灰……）

“烏發”影片公司正在匆忙地拍摄影片；除了不描写剛剛結束的戰爭以外，影片的題材可說是五花八門、无所不有了。然而，观众需要的却是痛苦的装模作样、瘋狂的暴行和悲慘的結局。我偶尔参观了一次这类电影的拍摄。父亲企图把女主角藏起来，情夫用鞭子打她，逼得她从七层楼上跳下去，男主角随后也上吊自杀了。导演对我說，为了适应出口的要求，他們还要給影片拍摄另一个幸福的結局。我多次看見，那些面色蒼白、身体孱弱的少年們是在怎样兴高采烈地欣賞着銀幕上一群耗子吃一个人或者一条毒蛇咬伤了一个美人的鏡頭。

我参观了“突击”派的画展；我面前的不是油画，也不是水彩画，而是一些用画笔和顏料代替枪炮和炸彈的人的歇斯底里的发作。我在自己筆記本中記下了几幅画的名字：《血的交响乐》、《无綫电的混乱》、《世界末日的色调》。精神上的郁闷要求发泄，甚至批評家們称之为“新表現派”或“达达派”的东西，也不像我們习惯中所指的艺术作品，而是同松姆河大会战的回忆、同暴动和叛乱、同

貼身穿的护胸衣有着更密切的联系。“突击”派画展的发起人韦尔登有着一副尖削的面孔和长长的头发。他喜欢談孿生子、直觉和文明的沒落。他在草草布置的画廊里就像在舒适的新居中一样,感到特別自在;他用邻近一个咖啡館送来的咖啡和奶油蛋糕款待了我。

我来到了馬格德堡;房屋的正面、电車、售报亭都慷慨地蒙上了一种歇斯底里的色彩。領導市政建設总局的是一位天才的建筑师布魯諾·塔烏特。科尔布捷^①是从几何学获得灵感的。是啊,他住在法国……然而布魯諾·塔烏特却生活在一个动乱的国家里,这儿有飢餓和投机,有昨天对巴格达的幻想和明日对印度的远征,有“啤酒館的叛乱”和工人的暴动。(希特勒掌权后,布魯諾·塔烏特逃到了日本,他很高兴自己能在那儿看見現代化的建筑——傳統的日本房子是明亮而寬敞的。)

我清晰地記得摆在莫斯科街头的至上主义派的繪画,但馬格德堡的見聞却使我異常驚訝。塔特林、馬列維奇、波波娃、罗得謙科的語言無論是怎样生僻,有时甚至枯燥,然而終归是艺术的語言。在德国的繪画中,那矯揉造作的風气和缺乏分寸感使我感到压抑,我觉得画在啼哭。

我記得哈森克萊維爾^②的詩集的封面:一个滿臉失

① 勒·科尔布捷(1887年生),法国著名建筑师。

② 哈森克萊維爾(1890—1940),德国表現派作家,后期作品中有反法西斯的情緒。

望神情的人在叫喊。当时的詩歌里充滿着五花八門的預言；魏爾菲勒^①和溫魯都在預言世界的毀灭。然而，对詩歌抱着淡漠态度的街道上的行人却沉默不語。

我遇見了列昂哈尔德·弗兰克^②。这时他已經四十岁了，成了有名望的作家，但仍然像个滿脑子尽是幻想的年輕人，他以为只要人們彼此看上一眼，微笑一下，那种仇恨的誤解立刻就会消失。而且他后来也很少变化；无论什么东西也不能使他变得冷酷无情。我在法西斯占领巴黎的时期见过他，战后他住在西德，当他来到柏林时，曾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作家們进行过友好的談話。他的一本书的名字叫《人是善良的》，这是非常主观的評價——弗兰克知道什么是党卫軍，不过他本人倒是个真正善良的人。

阿尔图尔·霍里切尔搖晃着他那灰色的鬚发說：“你瞧吧，不出一年，柏林的工人准会向莫斯科伸出手去……”

在外国商人和新式富翁(人們称呼他們“席別尔”)居住的地区，有一个“洛馬尼謝斯咖啡館”，这儿是作家、画家、小投机商和妓女的聚集地。这儿也可以碰見躲避墨索里尼的蓖麻油^③的意大利人和逃出霍尔蒂的監獄的匈

① 魏爾菲勒(1890—1945)，奥地利表現派作家。

② 弗兰克(1882年生)，当代德国作家。

③ 墨索里尼对被逮捕的人常常采用灌蓖麻油这种刑罰。

牙利人。在这儿，匈牙利画家莫果利·納吉同李席茨基就构成主义进行爭論；馬雅可夫斯基向皮斯卡托介紹梅耶尔·霍尔特的戏剧；意大利的幻想家幻想着工人对羅馬进行国际性的远征；然而，机灵的人却在搞小面額外币的投机生意。每逢礼拜日，举止端庄的市民都去赫德特尼斯教堂做礼拜，他們总要对“洛馬尼謝斯咖啡館”怯生生地望一眼，仿佛教堂的对面就是世界革命的大本营。

西柏林在当时也不愧是“西方的”：这不仅和历史的風云，而且也和自然界的風向有关：在柏林、倫敦和巴黎，有錢人都选中了西部地区，因为風通常是从大西洋吹来的，工厂普遍設在东部郊区。

西柏林的人仰望着西方，但同时也憎恨西方：防御共产主义的願望和复仇的願望交織在一起。在一些商店的櫥窗中可以看見这样的話：“此处不卖法国貨”；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席別尔的妻子們根本用不着顾虑能否买到赫尔林香水：爱国主义是会在发财致富的欲望面前让步的。但是莫斯科的卡梅尔剧院在来柏林作巡迴演出时，却不得不把法国小歌剧《日洛夫里一日洛夫里亚》^①改为《孿生子》，把《亚德琳娜·列庫略尔》改为《薩克逊的王子》。

在东柏林和北柏林有时可以听见唱《国际歌》的声

^① 法国作曲家列考克(1832—1918)的作品。

音。那儿既沒有人买卖外币，也沒有人因皇帝的出走而啼哭。那儿的人們过着半饥半飽的生活，一面工作，一面在等待着革命的爆发。他們很有耐心地等待着，也許太有耐心了……我看見過几次游行。人們摆出一副阴沉的面孔从大街上列队走过，不时地举一举拳头。但是游行必定要在两点钟結束，因为这是吃午飯的时间。我記得自己同一个工人談話的情形。他企图向我证明，工会會員數目的增加就意味着无产階級的胜利。对組織的热爱，是一种高貴的情感；然而在德国，这显得太过份了些。（一九四〇年，我看見了沒有汽車的柏林，柏林的汽車正在欧洲的公路上疾馳；第三帝国正在进行征服世界的事业。然而，街上的行人一見紅灯立刻木然不动，誰也不敢穿越街心。）我的交談者在一九二二年全神貫注在初級数学上。而外面已經是列宁和爱因斯坦的时代了……

在亚历山大廣場上的一个啤酒館里，我第一次听到希特勒这个名字。一个顾客热情地談論着巴伐利亚人，瞧，这才是真正的好汉！他們馬上就要出动了。这些都是自己人，是工人和真正的德国人。他們要让所有的人——法国人、犹太人、席別尔、俄罗斯人都受自己的支配。邻座有人表示反对，但是希特勒的拥护者却固执地反复說：“我是以一个德国人和工人的身份說这話的……”

馬克繼續在贬值；我来的时候，報紙只卖一个馬克；后来，买一份報紙就得付三十馬克。一条新的地下铁道

建成了。“小型舞場”里，一对对的情人拚死命地蹦跳着，仿佛在执行一項艰巨任务似的。劳合·乔治^①宣布說，德国必須分文不差地拿出全部賠款。由于长期的营养不良，死亡率不断上升。大家都在談論斯梯涅斯和斯平格勒。斯梯涅斯是大家十分熟悉的人物：他是新的帝王，是魯尔的統治者，是新的奥林普山上的赫菲斯特。讀过斯平格勒的著作的人不多；但是大家都知道他的一本书的名字：《西方世界的末日》（俄譯名为《欧洲的末日》），他在这本书中痛悼了他所熟悉的文化的毀灭。肆无忌惮的投机商、杀人凶手、凶恶的記者都在援引斯平格勒的話：既然死亡的时刻已經来临，又何必客气呢？甚至“西方末日”牌的香水也在市場上出現了。

罷工的風潮时有爆发。有一次在“約斯蒂”咖啡館里面，一个穿戴考究的人突然倒在地上。邻桌上的一位医生在診斷之后高声說：“給他一些真正的咖啡吧……这是长期营养不良引起的虛脫……”生活越来越困难，但是人們却繼續認真而努力地工作着。

在拥挤不堪的电車里，有人罵我是“波兰狗”。在考究的資產階級住宅的正門旁边的墙上，挂着一个牌子：“专供老爷出入之門”，就在这面墙上我看見有人用粉笔写了这样几个字：“杀死犹太人！”

① 劳合·乔治(1863—1945)，英国反动政客，1916—1922年任英国首相。

价格、謾罵声和失望都是无比的龐大。

《行动》杂志的詩人們写道，实行新經濟政策之后，他們再也不相信俄罗斯了，德国人将要向世界表明，什么才是真正的革命。一个詩人說：“首先应当在各个国家里同时杀掉一千万人，这是最低数字……”（赫尔岑曾著文評論过“德国革命的梭巴开維支”海因岑^①，后者幻想道：“只要从地球上消灭掉二百万人，革命事业就会一帆風順的。”）《紅旗报》的一个撰稿人对我說：“你的《胡列尼托》是一本不成体統的书！我不懂它怎么能够在莫斯科出版。如果我們掌握了政权，我們是不会要这种书的……”

当时的总理是魏尔特。他打算拯救德意志共和国，所以在拉帕罗同苏維埃俄罗斯签订了協議。英国人和法国人对此大为不滿。至于德国人民，他們繼續在等待着，一部分人在等待革命，另一部分人則等待着法西斯的暴动。一九五二年，我在維也納的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上遇見了魏尔特总理。这时他七十五岁了。在一次拖得很长的會議之后，我們进行了交談。魏尔特說：“作家在写完一部长篇小說时，定会有一种滿足的感觉——即使这部作品的篇幅只有薄薄的数十頁。一个政治家的晚年却是另一回事；对他來說，重要的不是个别的成就，而是結局。我可以說，我的一生是被一笔勾消了。起初来了希特勒。我

^① 海因岑(1809—1880)，德国共和主义者，政論家，巴登起义的参加者；梭巴开維支是果戈理《死魂灵》中的人物。

知道，战争将要爆发。我不得不到国外去。战争结束了，又来了阿登纳。我们在一个党内，他比我大三岁。我对他说，他在重复自己前任的错误。他是个聪明人，但却不能理解这一点……我不愿活到第三次世界大战。可是我能做些什么呢？难道在你们的大会上发表演说吗？这个，请原谅，是幼稚的行为。”（他闭上了自己那双呆滞而疲惫的眼睛……）

夏季的一天里，“康苏尔”组织中的一个法西斯分子在格魯涅瓦尔德大街上刺杀了外交部长拉頓諾。当警察查出了凶手们的线索后，他们全体自杀了。法西斯分子的葬礼是按照军队仪式举行的。

店主们来不及改变货物的价格；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价格的基数不变，只增加其系数。昨天系数是四百，今天就成了六百。郊区影院的银幕上总是那个癫狂的加利加里医生。柏林在一天内要发生九次自杀案件。一种专门研究同性恋爱的理论与实践的杂志《友谊》开始出版了。

德国在那几年里发现了自己的肖像画家——赫奥尔格·格罗斯。他笔下的席别尔的手指头很像一根根小灌肠。他所画的过去和未来的战争的英雄们，都是一些佩戴铁十字勋章的仇恨人类的家伙。批评家说他是表现派；其实他的画是冷酷的现实主义和预见的结合，不知为什么人们把这种预见叫作幻想。是的，他敢于描绘赤身

露体坐在办公桌旁边的三級文官，描繪正在掏尸体內臟的穿得花枝招展的胖太太以及冲洗血淋淋双手的凶手。在一九二二年，这看来只是一种离奇的想像，但是在一九四二年已經是司空見慣的了。格罗斯的繪画的严峻是富有詩意的，它們和希尔得斯汉市的木刻丽达神像、哥特字母的印刷体格言、市政局下面的酒館和堆在狹窄的中世紀街道上的酒麵的气味具有相同的性质。

格罗斯生着一对孩子般的明亮的眸子，臉上时常流露着羞澀的微笑。他是个溫和、善良的人，憎恨暴虐，幻想着人类的幸福；也許，正是这个原因使得他毫不留情地画出了未来的党卫軍、战利品的爱好者、奥斯威辛的砌炉工得以滋生的溫床。

当时，全世界都在注視着柏林。一些人感到不安，另一些人抱着希望：欧洲未来数十年的命运将要在这座城市里得到决定。这里的一切——房屋、風俗、道德以及对数字、螺釘和图表的信仰对我都是陌生的。虽然如此，我那时写道：“我用那么多不吸引人的描写来补充我对柏林的評述，大概会使你觉得你沒有住在柏林是一种幸福……我請求你相信我对你說的話：爱柏林吧，这是个有着令人生厌的紀念碑和不安的眼睛的城市。”我怀着不安与希望在这个城市里度过了两年的岁月：我觉得，我是生活在前綫上，只是炮火沉寂的短暫時刻拖长了。但是我也常常問自己：我在等待什么？我希望相信，但是又不能

相信……

馬雅可夫斯基在一九二二年秋天初次来到柏林后，便表示了自己的爱情：“德意志，今天我在你的土地上漫步，我对你的爱情較前更加深厚。”有时詩人看見的东西正是批評家所沒有看見的，于是詩人就遭到責备，說他錯了。有时詩人和其他人一起錯了，于是批評家就像善良的主考人一样，贊同地点点头。馬雅可夫斯基說到德国时，他重复了一九二二年千百万人心中所想的那些話。不錯，巴伐利亚苏維埃共和国的灭亡，卡尔·李卜克內西和罗莎·卢森堡的遇害已經是过去的事了；但是，汉堡起义的火光却要在未来的天空中出现。对于当代人来说，一切尚未定局，一九二二年秋天，我和其他人一起在等待着革命。

不应当說德国人是溫和的和守中庸之道的。不仅表現派的艺术，德国的历史书籍对此也渲染得太过分了。

馬雅可夫斯基写道，赢得胜利的德国工人将要“穿过布兰登堡大門的威廉拱門”。然而历史作出了另外的决定：十一年后，穿过这些大門的是疯狂的希特勒分子；而在一九四五年五月是苏联士兵……

2

我不知道那几年里柏林有多少俄国人；大概一定很